

傻子沉浮录



年广九的故事，我们从冬天采集到了春天，又从春天采集到了夏天……

我们不能说已经非常了解年广九，但我们毕竟通过傻子的经历、傻子的事迹，乃至对傻子的争议，从中窥见了一位市井名人复杂的灵魂。

……我们的心里百感交集，那滋味，就像嗑了一枚用人生经历卤制出来的五味俱全的傻子瓜子。

郑松茂 主编

杭州出版社



浙江电视台台长梁雄（左一）与常务副台长钟桂松在电视纪录片《傻子沉浮录》研讨会上。



电视纪录片《傻子沉浮录》研讨会上，
专家们在发言。



同志接受采访。

中共芜湖市委书记田维谦(左二)



摄制组。

《傻子沉浮录》



摄制组人员与年广九(左三)合影。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傻子沉浮录 (解说词)	刘 郎 张嵩山等 (2)
真实：中国纪录片的生命	
——兼论《傻子沉浮录》的审美价值	钟桂松 (55)
《傻子沉浮录》创作回顾	郑松茂 (64)
表述三说	刘 郎 (72)
真实的诱惑	
——《傻子沉浮录》纪实声音创作谈	赖 黎 (76)
复杂的小人物，时代的大课题	
——评刘郎和他的《傻子沉浮录》	高 鑫 (84)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杜 高 (93)
从小人物的命运看大时代的走向	钟艺兵 (98)
我读电视纪录片《傻子沉浮录》	李习文 (105)
思想的魅力	彭加瑾 (115)
洋洋洒洒都是爱	张国治 (121)
评电视片《傻子沉浮录》	孙秋萍 (127)
《傻子沉浮录》对中国电视的启示	袁 敏 (134)

沉舟侧畔千帆过	徐舫州	(137)
起点高、立意深，是叙事诗、也是论文	李葵南	(143)
“傻子”沉浮的社会心理环境	丁祖荣	(152)
市场经济潮向的一面多棱镜	剑 飞	(157)
浅说《傻子沉浮录》的创作特色	高 蕾	(162)
田维谦同志的信		(169)
《芜湖日报》、《芜湖晚报》		
文章选登		(171)
后记	浙江电视台创作研究室	(177)

前　　言

六集电视纪录片《傻子沉浮录》是浙江电视台历时一年，精心创作摄制的一部新作。它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绰号“傻子”的年广九，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名人。改革开放初期，他抓住市场机遇，创制了以“傻子瓜子”命名的瓜子品牌，并使“傻子瓜子”畅销全国各地，走红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名噪一时，成为中国改革历史过程中个体经济发展的知名人物。此后，他几番跌宕，数度沉浮，更使其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傻子沉浮录》从不同角度透视了年广九这个典型人物复杂性格的各个层面，通过对他与他的家庭、事业，以及对他与他所在的城市，他与他所依靠的市场的探究，全面揭示了年广九的斑斓人生。

该片首播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之后，浙江卫视应观众要求接连两次重播。为了总结与分析《傻子沉浮录》的创作经验和成败得失，今年5月下旬，浙江电视台召开了《傻子沉浮录》研讨会。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吉林、广东、四川、安徽、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编辑、记者和年广九所在的城市芜湖市的有关代表，与浙江电视台的领导以及《傻子沉浮录》的创作者一道，对该片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艺术特色以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在这本书里，收编了《傻子沉浮录》的解说词以及研讨会诸位专家和芜湖市各界有关人士的评论文章，衷心希望这部书能为繁荣我国电视文艺创作起到促进作用；能对热心探究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轨迹的人们有所启迪。

编　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

六集电视纪录片

傻子沉浮录

(解说词)

总策划：梁 雄 钟桂松

策 划：郑松茂

撰 稿：刘 郎 张嵩山

浙江电视台创作研究室录制

第一集

从小贩到名人

总片头——

以炉火为衬底，画面里游进字幕——

“这里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43条注释

这位，就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80年代初期，就是他，凭着一把锅铲，在短短几年之间，炒出了百万之资，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称傻子的年广九名声鼎沸，可以说家喻户晓。十几年间，他几番跌宕，数度沉浮，更使得小瓜子成了大话题，中国伟人名之曰：“‘傻子瓜子’问题。”

人们曾关注傻子的过去，同样也关心着傻子的今天。是的，市场弄潮的小商贩，风云一时的大明星，如今，被时代的风浪抛向哪里了呢？1996年春节前夕，我们摄制组迎着冬雪走向芜湖，寻访傻子年广九。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寻访傻子，是因为春节前夕的瓜子行业，无论是炒制还是销售，在一年当中都是难得的大忙季节，用瓜子商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年之季在于冬”。

傻子年广九依旧操练着他的老本行，在芜湖市的中山桥下，经营着他的傻子瓜子门市部。尽管傻子瓜子已经从全国市场上溃退下来，他仍然坚守着芜湖的这座桥头堡。

对在柜台里忙碌着的年广九，顾客们一点也不感到稀奇，因为没有人觉得他是什么名人。在芜湖老百姓的眼里，年广九还是年广九，还是当年那个傻子，而年广九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名人。尽管傻子的绰号在芜湖是妇孺皆知。

同期声：

- (1) 卖水果的小伙子的谈话。
- (2) 卖鞭炮的小媳妇的谈话。
- (3) 街头的老太太的谈话。
- (4) 街头的老人的谈话。

街头老人所说的“傻子给日本人卖瓜子儿，被日本人从楼上踢到了楼下”，显然是把年广九给演义了。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年广九才刚刚出生。但名人一旦出了名，演义是免不了的，就像有人说年广九拥有1亿资产，纯属天方夜谭一样。

看年广九现在的傻子瓜子总厂，就知道他是不是拥有1亿资产了。年广九的生意已远不如以前那么红火，两个儿子已经与老傻子分家，拉起的旗号，虽然也是傻子瓜子，但都已各立门户。年广九年轻的妻子彭晓红也已于1995年与傻子协议离

婚，年广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这位孤家寡人一身数职，惨淡经营，瓜子总厂办公室兼收发室里，只有一只方凳和一部放在上面的电话机，连个办公桌都没有。

年广九的谈话：

……现在商品经济不需要办公桌，需要人，（我）又是会计，又是科长，又是采购员，又是业务员，又是厂长，又是营业员，卖东西呀，忙不过来，自个儿去，自个儿销售，自卖，要放下过去那个官架子。

年广九虽然放下了官架子，但他这个厂长的权力却时时都没有放下，他的大印就戴在他的手上。当然，是名人，光用印章还不行，还要经常来点名人签字才算得上潇洒，只不过年广九的签字没能像歌星、影星那般“帅”。因为年广九这一辈子，仅仅会写这么三个字——“年广九”。歌星、影星的签名写在追星族的笔记本上，年广九的签名写在有关瓜子的单据上——纯粹是为了实用。别看年广九这一张批条分量很轻，只不过关乎几袋瓜子，可在八十年代他当总经理的那会儿，他这三个字的含金量，竟然每个字就高达9万多元，此事我们暂且不表，留待后叙。

年广九原来是有办公室的，早已闲置不用，他带领我们去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又讲了一番大道理。

年广九的谈话：

“这是椅子，这是办公桌，不能用，一用就‘修’（修正主义）了，什么就不懂了，都坐在这算是什么呢，坐在这儿咋懂

呢，不知道行情，市场的行情，这样就把它封掉，只要人站着，两个腿用劲，就是一切，代表一切。”

年广九虽然人称“文盲”，但讲起话来，却能滔滔不绝。只不过他的句子有着明显残缺和逻辑混乱。比如，他曾经说他崇拜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发明了秤，他的意思，其实是指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面对滔滔不绝发表演讲的年广九，我们猜想，他的这种讲话的勇气，一是练就于小商贩生涯的长期叫卖，二是练就于接待记者采访的现身说法。据芜湖市宣传部门概略统计，自1983年以来，全国有14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和作家采访过他。

可遗憾的是，他的话听起来不大好懂。芜湖人说，傻子讲的，就不是地道的芜湖话。傻子原本就不是芜湖人嘛。他的原籍，在蚌埠附近的怀远县，是当年淮河发大水时逃荒来到芜湖的。

芜湖市这个喧闹的轮渡码头，过去人称伤心渡。

之所以叫它伤心渡，是过去江北的难民，就在那里渡过长江，继续向南方流浪，并在此洒下伤心之泪。数百年来，从贫瘠的土地上，曾涌过来无数逃荒的难民，童年时代的年广九，就曾夹杂在那些难民之中。

我们在蚌埠采访年广九的一场官司时，得知淮河水利委员会有一部当年淮河发大水时的纪录片，年广九说很想看一看。

那场大水的准确时间，年广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随着父亲逃难的情景，却记忆犹新。年广九说，这一位逃难的妇女，很像他的母亲。

年家老小和许多难民一样，走过一水横流的伤心渡，在芜湖落下脚来，父亲的绰号叫作老傻子，做点贩卖水果的小本生意，年广九岁就开始做生意，可以说从童年时代，年广九命运之船的缆绳，就拴在了经商的码头上。

作为安徽人的年广九，虽然经商，却不是徽商的正宗，而作为年广九从父亲那里承传的“傻子”的绰号和小商贩的职业，却是地道的嫡传。

记者与年广九的谈话：

“你从几岁开始做水果生意呀？”

“9岁。9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学这个梨子什么叫公、母。这是母，这是公，公的跟母的不一样，一个是有脖子的，一个凹进去的。”

“水果生意一直做到什么时候？”

“29岁。以后就搞鱼（贩鱼），做鱼（的）生意。”

“鱼？贩鱼啊？”

“贩鱼，就是水果哪……到了4月份呢，这个水果就少了，抽着空子就卖鱼，起早就到农村去，把鱼趸着来，到菜市场卖，后头又做水果，做了两年鱼，后来又做水果，鱼呢难买到，起早摸晚。”

“哪年开始做瓜子生意的？”

“七二年。”

“当时是卖别人炒的瓜子吧？”

“对……”

在芜湖采访，我们发现居然有好几个人自称是年广九的师傅，但年广九说自己的师傅是一位叫熊仁寿的老人。熊仁寿已经去世，我们便访问了熊仁寿老人的女儿熊桂芝，熊桂芝该算

是年广九的师妹了，因为得了重病，现在已经卧床不起。

熊桂芝的谈话：

“……当时的情况下，他是没米下锅了，找另外一个妇女借的钱，借五块钱，然而没有借给他，借了两块钱，他可怜，他就蹲在地下哭。我父亲就讲了，你蹲在地下哭干什么。他说我有三个儿子，我这两个钱怎么生活，我只有两块钱，我就借了两块钱。我爸爸就对我们讲，我们实在是要拉他一把了，因为古话讲，宁赏朋友一丈布，不丧朋友一条路。后来我爸爸讲，他太苦，我们呢就教他炒。开始他没有找我爸爸的时候，找妇女借钱的时候，找（那个）妇女教他。那个妇女教他呢，炒咸瓜子不放明矾，咸瓜子永远都是潮的，晒不干。教他糟炒，炒出来，嗑不出来米；碎掉了，再不就苦掉了。她不是教他，她是好像不许他走这条路，这条路只是我们这么几帮所得，任何人不许走这条路。后来我爸爸教他了，怎么炒，怎么炒，怎么摆作料，咸瓜子里面要摆明矾，才能收水，滤起来一下工夫咸瓜子就有卤，就能起盐酸，就干燥，噢，他不晓得，这里面有好多诀窍，后来教他炒了不少次，后来呢，（他）回家了炒。我爸爸不放心，派我们两个到他那儿去了，我姐姐也是炒瓜子的能手，我炒得不怎么样，我姐姐教他……整整蹲了一上午，教他怎么怎么，终于他瓜子炒出来了，他的生意先不怎么样，后来是越做越红，越做越红。”

“瓜子包子，那时候我们是五分钱一包一角钱一包。是我教他包的，他不晓得包。那天晚上我代他包了一晚上，叫他出去卖，卖了三天的瓜子，包子都是我包的。后来我又手把手地教他包，他才晓得包这瓜子包子。可是，我家把路教给他了，所有卖瓜子的人全都恨着我，我的父亲给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全都讲我的父亲不是人，为什么把这条路丢给他。他这个人不结人缘，后来我父亲讲怎么办呢，看他老婆要离婚了，要找他离婚，三个儿子他要卖掉一个，不可怜吗，随你们怎么讲了，反正我已经教过了，这条路呢，他也走出来了，后来他的生意很好，我们家的瓜子是卖不动了，他越做越红，他越做越红……”

瓜子，在今天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二十年前，瓜子的身份却是高贵的，它在当时是国家二类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人经营是违法行为，被视为“投机倒把”。也就是在那个年月里，熊仁寿老人因为卖瓜子，遭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追查，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熊桂芝的谈话：

“……是清明，那天是清明。我父亲呢，6点钟吃过饭，电影是7点半的，因为我们卖瓜子之前，要提前1个半小时到电影院门口，等待，那天晚上是赶人民电影院，我们……我爸爸那时候已经有67岁了，端着瓜子盘子，因为那时候不许做小生意，小生意就是投机倒把，没有办法。瓜子摆什么地方呢，全部绑到身上，不能摆荷包（口袋）外面。他们搜身，全部一起把棉袄缝了好多荷包，揣到棉袄荷包里面，外面再罩个大褂子，就这样……我父亲正在卖的时候，电影院进场了。正在卖的时候，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就是市工商所，有个外号叫谭麻子（的），是工商所的，他跟着就逮我父亲，他专门逮我父亲。我父亲岁数很大了，67岁了，很可怜，端着个盘子，晚上……跑……使劲地跑，没命地跑，因为怕工商所……把我父亲……一下逮着，要是逮着了，那天晚上……我们要损失四五块钱，那时候，四五块钱很值钱，我爸爸跑到

……很长的一段路，工人食堂门口，叫工人菜馆，终于倒下去了，倒下去……我爸爸……再都没有爬起来……当时，还能有一口气，有两个好心的人，一个住在十九道门，一个住在三街，他们两个把我爸爸从地上扶起来，但是我爸爸不会讲话了，就讲了个……白……瓜……然后就讲不出来了……”

熊桂芝所讲的她父亲熊仁寿的故事，是一个瓜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许多小商小贩的故事。许多人都以为小商贩们对政治麻木不仁，眼里只有钱，这实在是个莫大的偏见。事实上，他们一边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另一边又注视着政策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哪怕一个小小浪头，就可能颠覆他们的生命之舟。

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商贩们曾活得战战兢兢，难怪改革开放初期，芜湖的个体户们曾毫不忌讳地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春节将近，瓜子行业越发忙碌，在此期间，年广九为我们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这尊 59 岁的身板，虽然已是瘦骨嶙峋，但是他舞起锅铲来，却像是《水浒传》的人物舞弄着一件称心如意的兵器那样自如而娴熟，并捎带出一种原始舞蹈的韵律。

炉火正旺，锅底通红，恰到火候的一锅瓜子，随着铁铲的美妙运动旋转翻覆，噼啪作响，在腾腾的烟雾里，金属的磨擦碰撞之声，鸣奏着年广九这位市井名人的华彩之章。

年广九该着出名，一是他交上了好运，熊仁寿师傅一生都未敢憧憬过的可以甩开膀子炒作瓜子的好运；二是他长期练就的敢闯码头的胆子。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初期，许多小商小贩都还对党的政策观望的时候，年广九便挺身而出，自产自销，在芜湖的闹市区十九道门公开摆出了瓜子摊位。今天，别看满世

界都是小商小贩的吆喝叫卖声，多一个摊位都挤不下了，可当年敢于做第一个摆摊儿的人，却需要非凡的勇气。

年家几代贫寒，父亲去世后给年广九留下的遗产，只有两间老宅和一个称作“傻子”的绰号。傻子，这是个带有几分轻蔑的绰号，但是，它要是作为一种商品的牌子，却醒目、易记、好懂。有人给年广九出主意，你的瓜子，就叫傻子瓜子吧。在商界，行家说，这叫逆反心理销售术，可以给顾客带来奇妙的心理附加值，它的卖点，就在土味十足的地方特色之中。

第一个报道傻子瓜子的是《芜湖报》，这篇千字文章，是对年广九从小商贩到名人的第一次记载，这等于是由政府出面替年广九作了一回广告。这份报纸出版的当天，年广九的瓜子摊位就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年广九马上雇了两个帮手，连夜赶炒了两百多斤瓜子，可第二天上午就卖得精光。

傻子瓜子的销量直线上升，可就在这供不应求的当口中，也就是在《芜湖报》发表文章一个星期之后，年广九突然宣布瓜子大降价，零售价由每斤的两元四角，降到一元七角六分。就年广九的本意而言，此举出于薄利多销的基本商业原则，然而它对于炒货业，却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不仅使得独家经营几十年的国营瓜子无人问津，也使得那些散落在街巷间的瓜子个体户也生意惨淡，不得不纷纷忍痛杀价。

在傻子瓜子的刺激下，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苏，三年的时间，全城便出现 57 家瓜子公司、工厂和商店。在这座人口仅几十万的中等城市里，瓜子经营者们共推出以傻子瓜子、迎春

瓜子和胡大瓜子等全国著名品牌为代表的二十多种瓜子牌号，形成了以傻子瓜子、迎春瓜子和胡大瓜子为三大巨头的瓜子城格局。

芜湖瓜子业起势甚猛，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50万公斤，1984年就剧增到16200万公斤，创下5600多万元产值，上缴国家利税达400多万元。瓜子业的兴起，势必带动销售业的发展，散布于芜湖大街小巷的200多个瓜子零售网点，解决了近千名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芜湖不产籽瓜，而籽瓜产地又远在祖国的东北和西北，这样，每年几千万公斤瓜子的输入输出，便牵动了全国大市场销售循环的链条。

可以说，年广九也是一位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雇工者。

由于傻子瓜子供不应求，年广九便开始了雇工。今天，面对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8000万人的民工潮，人们已不足为奇，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年广九的雇工行动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了傻子年广九。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总设计师1984年10月22日的这段话，后来被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傻子年广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会产生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的广泛社会影响。当时，他的名字登上了各家报纸，形象